

最后13年里，能够参与两座长江大桥的建设，对他来说是最大的褒奖。在他故去23年后的1985年，竟以第一获奖人获得国家首届科技进步特等奖。他用生命设计的首座南京长江大桥，还被载入吉尼斯纪录。这是他生前没有想过，也不会想到的事情。”诚然，梅昉春这一生，多少是有些

曲折和遗憾的，际遇和机遇似乎总是脱节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一直坚守着、牵挂着祖国的桥梁事业，直到生命的最后，真正做到了死而后已。也正是因此，中国漫长而艰难的复兴之路上，不但有他主持或参与设计建造的一座座百年大桥，更留下了暗暗浮动的“梅香”。

齐亮：舍身救地下党员

○马识途（1945届，联大中文）

1941年，我奉南方局之命，考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隐蔽，执行周恩来指示的“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”三勤方针。我第一个交好的朋友就是齐亮。他是我相交最亲密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妹夫，更是我一生最尊敬的革命战友，一个舍身救党员、英勇就义的烈士。

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缘分，我一进西南联大住进宿舍，就和齐亮住在上下铺。一见交谈，便很相得。我们一块儿上课，一块儿到茶馆喝茶，真有相见如故的感觉。一谈起来，对许多时事问题有相近的观点。他似乎有意要猜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正如我也猜测这个如此想亲近我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。如果不是最坏的特务想来试探我，便是最好的党员。

我们彼此警惕却又隐隐试探，真像《三岔口》那个京戏，在黑暗中对打对试了好半天，最后终于大白，原来正是想寻找的战友。正是如此，当我不期而然地为我那不久前牺牲的爱人而暗自伤悼不已时，他忽然也很难自禁地喊出“血呀，血呀，中国的血要流到哪年哪月”的话，我不禁泪奔如雨时，他才对我说：“我猜想



齐亮
学长

你很久了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是……？”我马上阻止他再说下去：“不要说了，我也明白了。”

我们终于各自请示了自己的上级联系人，上级云南省那边决定打通关系，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新支部，领导西南联大进步学生活动，我任支部书记，他任委员。从此我们本着南方局的指示，既要长期埋伏，又要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我们在同学中不断寻找流散的党员和进步分子，组织各种进步活动。

齐亮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颇为出色的“帅哥”，北方高大瘦长的倜傥青年。他是一个特别富于磁性、生就一种亲和力的人。无论什么场合，只要他一出现，不久

□ 人物剪影

便成为耀眼的中心。他举止文明，谈吐优雅，乐于助人，颇有燕赵遗风。他工作不久，就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和中间状态的同学。他主办同学最关切的伙食团，号称“和尚食堂”，为大家谋福利。他的一表人才和进步思想，吸引了大家，连校花也想黏住他而倾向进步。他在和“三青团”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的选举时，旗开得胜，先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三主席之一，后又被选为昆明全市学联主席，领导全校和全市学生的进步活动。他发起组建了“民主青年联盟”，并在其中发展了许多党员。

1945年秋，我们两人都在中文系毕业了。中文系有意留他做研究生，可是当时云南省工委决定要在滇南一带农村，准备发动武装斗争，我和齐亮都被选中到滇南工作，我任滇南工委书记。齐亮被派往滇南少数民族地区，做基层农民发动工作，并负责好几个县的中学的地下党员联系和领导工作。名义是在元江乡下办小学（这里又有一段插话，少数民族少女，能歌善舞，齐亮也学会了跳舞，几个漂亮少女就瞄准了他，被他拒绝了）。

1946年夏，南方局领导决定调他到重庆，在南方局青年组负责学生工作。他便和我分别了，我颇怅然。幸喜不久我也同时调南方局到川康特委工作，我到南方局又和他见面了，十分高兴。听他说起来，他正在像西南联大时那样，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中间分子身上，颇有成效。这对我到成都做学生工作，也有启发。

1947年3月，国民党挑动内战，已迁到南京的原南方局和留在重庆的重庆分局都被迫撤回延安。齐亮本也在分局撤退之列，可是他却设法没有跟着撤离。他继续

留在重庆市委工作，担任了渝北县委书记。

当时，南方局撤走后，整个蒋管区的地下党组织都由上海分局钱瑛同志领导，但是上海分局与云南省工委和我所在的川康特委一时失去了联系。因为钱大姐知道重庆市委下的齐亮认识云南省工委的书记，也和成都川康特委的我更熟，于是派齐亮想办法到成都和昆明的党组织联系。

齐亮首先到了成都，住在我家。老朋友又见面了，且在危难中，自有一番亲切。他把上海分局联系川康特委的秘密口号和通讯地址告诉了我，我把川康特委的全部组织情况告诉了他。他担负如此重要的上下联系的政治交通极端机要工作，足见上海上级对他的忠诚十分信任。我们都舍不得分离，他决定在我家里多住几天。

我的妹妹马秀英在四川大学刚才毕业，尚未工作，住在我家里。她在川大参加学生进步活动，是党的外围组织“民协”的成员。她知道我是干革命的，很亲近我。齐亮来了，她当然也知道是干革命的，对他也亲近。齐亮的“帅哥”模样，一下便被我妹妹看上了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她偷偷对我说，她想和齐亮做朋友，要我介绍。

其实这都用不着我介绍。齐亮喜欢做群众工作，见到秀英就对她进行思想工作，以提高政治觉悟。秀英当然乐于听齐亮的教导。她对我说：“我一见他，我就心跳，我一听他讲话，我就很高兴。”秀英有意带齐亮去成都各地旅游，几乎天天出去，晚上才回来。看来不仅秀英有意，齐亮也动心了。不过他似乎并不想和秀英恋爱。他对我说，他身负重大政治任务，要马上坐飞机去昆明向云南省工委书记传达上海分局指示去了。他对妹妹的痴情很

感动，对我说：“我看你妹妹是可以吸收入党的了。”我说：“川大党支部是准备吸收她的，我这个妹妹你看怎样？模样还可以，政治上进步，她对你一见倾心，把你黏上了呢。”齐亮笑一下说：“可惜她在成都，我在重庆，没有缘分哟。”

齐亮买了去昆明的飞机票，走的头一天晚上，他们两个在小屋子里，叽咕到深夜，不知说些什么。第二天齐亮走了，秀英牵心挂肠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要她出去找工作，她不大理会，过了几天，她忽然对我说：“我要去找齐亮。”

之后，她老在自言自语：“我要去找齐亮！”我看她痴迷齐亮就似要发精神病了。我说：“你不是党员，怎么找他呢？”她说：“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跟他去干革命。”我知道齐亮的掩护职业，能找得到他，但是齐亮是不是看上她了呢？秀英却说：“不管他爱不爱我，我爱他，我跟他去革命。”

我莫奈何了，只好让她去重庆找齐亮。她欢天喜地地到重庆去了，一去便再也没有音信。

1948年4月，因重庆党组织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，特务在各处抓人。这消息传来，我想齐亮一定是特务的抓捕对象，一定在做党员紧急疏散工作。我为此搬了家，也不知秀英怎样了。

那年6月，我到已搬到香港的上海分局钱大姐处汇报工作。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，汇报工作，接受指示，进行整风学习。我从香港回四川路过重庆时，设法找到罗广斌，才知道重庆党组织破坏详细情况，知道齐亮和秀英没有被捕，特务正四处抓人。

罗广斌跟我回成都避难。不久齐亮和

秀英也突然逃到成都，找到了我。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已经结婚，秀英已经入了党，跟齐亮一块儿做党的工作。齐亮说他冒了很大危险，紧急疏散一批党员后才到成都来避难的。我把他们安排到温江中学教书，本来好好的，却因有特务去温江中学查问，他们又走避到成都。我正为他们找好了避难去处，却不知道刘国定这个叛徒由特务押着到了成都，坐上吉普车，天天在街上转悠，抓从重庆逃到成都的地下党员。后来听说齐亮上街在春熙路被刘国定撞上了，当场被捕。特务从他身上搜出的身份证上得知他的住处，赶到那里，抓到了秀英。后来听说，秀英本来打扮成一个无知识的乡下女人模样，特务把她看得并不紧。那院子的主人安老太太是我们联络站的人，她叫秀英上厕所时，可以从厨房小门走掉。秀英却不理睬，只管收拾衣物，说要去找齐亮，是死是活要跟齐亮一起。特务把他们两个抓回重庆去了。结果两人在重庆快解放前特务的大屠杀中，都英勇牺牲了。

重庆解放前夕，罗广斌等人逃了出来，我们不久见了面。广斌说齐亮入狱，表现非常英勇。一进去特务威胁他说，两条路，一条自首，放他走人，一条马上枪毙。齐亮站起来就往外走，特务惊问他干什么，齐亮说：“你们不是说两条路吗，我走第二条，走，你们执行吧。”把特务都惊呆了。广斌说，特务们认为对这样的共产党人，动什么刑罚都是白费劲。所以齐亮入狱近一年，直到他走上刑场，都没有被审问过，更没有对他动过刑。他在狱中还写《支部工作纲要》，组织难友过“组织生活”呢。广斌说，在狱中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，大家都高兴，齐亮却说

□ 人物剪影

他要上路了。果然，特务叫他出来，对他说换个押他的地方。齐亮知道他的大限到了，从容地走向刑场。秀英是在狱中集体大屠杀时被杀害的。

时间过去了六十年，广东的作家吕雷和几个作家到重庆出差。吕雷临走前，他的父亲吕坪告诉他：“你有机会到重庆，一定要去烈士陵园，一定要找到齐亮烈士的塑像，向他叩拜，默哀致敬。”吕雷这才知道，他的父母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重庆做地下党工作，由于叛徒出卖，特务已准备逮捕他们，但他们和支部其他同志事先却不知道。是齐亮冒了最大的危险，赶在特务前面找到他们，叫他们马上离开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吕雷的父母，甚至整个支部的人都会被捕牺牲。齐亮当时已经清楚知道，特务正在四处抓他，然而他为了救出

其他同志，不惜冒生命危险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救同志于灭亡。

吕雷到重庆后，在歌乐山专门找到齐亮塑像，向他叩拜，告诉他，通知到的同志都平安转移了。他的父母活了六十年后，一直念念不忘救他们的烈士。为此，吕雷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，如果没有齐亮舍身救人，就没有他的今天和其他许多人的今天。吕雷问，这是一种什么力量，使烈士们视死如归？信仰，就是坚定的革命信仰。

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我，我后来写文章说：“人无信仰，生不如死。”我把这八个字写成书法作品，由《光明日报》刊登在副刊上。

（转自《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人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11月，马识途著）

蒋金涛：“一二·九”运动影响了她的一生

○ 郝锦绮 郝明理



蒋金涛学
长

蒋金涛（1912—1972），女，曾用名蒋宪端、金涛。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江苏太仓。在苏州振华女中学习时曾任学生自治会长并参加学联。1935年在清华大学

读书期间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同年四五月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，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先后在重庆清华中学、树人中学教书，并任清华中学副教务主任，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。1941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秘书和英文翻译，并负责编辑出版中英文宣传册。

1945年秋国共谈判期间，任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秘书。1946年5月，在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工作。同年7月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